

一种关注

扶贫题材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

从冷峻的现实困境中突破 绽放理想信念的光芒

卞天歌

在曲折的产业扶贫叙事中，探讨精神扶贫的重要性

《江山如此多娇》采用了以“产业扶贫叙事包裹精神扶贫主题”的呈现形式，一边勾勒产业脱贫实践中上下求索的艰难历程，一边紧扣住精神扶贫主题，挖掘扶贫工作的难点、痛点，这是该剧难能可贵之处所在。

剧中，一系列层出不穷的矛盾与障碍，锐利地刺向产业扶贫所涉及的各个主体、各个环节中的问题。村书记濮泉生带领村民终于摸索出了桑树种植之路，却首先遭遇了有关部门“一刀切”的懒政行为，创业险些夭折；地处深山、交通极度不便的碗米溪村终于迎来了修路的机会，但征地拆迁的种种典型矛盾又随之出现；安土重迁的惹阿公不愿出让土地，田老八为了争取更多的搬迁款开始抢种、抢建……这些情节切中时弊，真实地构建了脱贫攻坚的现实社会图景。

在曲折的产业扶贫故事讲述中，不断发出对精神启蒙重要性的追问给予了作品凌厉的触角。剧集开篇便是一出由人的思想顽疾所引发的悲剧。山洪暴发在即，村里的惹阿公非要带上自己的寿材才肯离开家。镇书记冒雨帮他转运寿材，脚下一滑，滚下了山，不幸牺牲。在此，落后的思想首先化作无形的伤人利器，奠定着全剧的反思基调。扶贫干部全心投入，带着大家埋头苦干一年多，只因现阶段还没有收益，便直接得到了垫底成绩的评议；第一书记沙鸥劝说村民拿出各自刚得的分红再入股，集资发展大产业，可油盐不进村民们只不管不顾地同声高呼“分红！分红！”，村民们的“现实”让人心寒又无奈。贫困群众的短视取向被这几处细节描摹得清晰，碗米溪村的精神启蒙工作势在必行。

还值得肯定的是，《江山如此多娇》着意将精神脱贫的曲折性真实地展现出来。无论是“等、靠、要”的懒汉麻长顺，还是嗜赌成性、善妒暴戾的田老八，这些人不是在一夜之间觉醒的，而是经历了痛苦且不断反复的精神蜕变过程。在此，精神贫困的顽固性并没有被低估。作品显示出了足够力度的关注与耐心，对人物的精神成长历程有着绵长、曲折地展现，强调他们要通过自我的精神奋斗而启蒙，完成精神自救。此外，对留守儿童与农村女性生存现状等社会问题的观照也显示出了创作者较强的人文关怀。这也使作品得以克服“只见扶贫人，不见脱贫人”的创作误区。

客观来说，《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扶贫剧。作品对诸多真实扶贫困境的揭示是有深度的，所反映的问题也是到位的。不难推断，创作团队一定是深入过基层，以双脚丈量过山区土地，以双亲亲自“看真贫”进而完成创作的，绝非脱离扶贫生活，缺乏事实根据地进行面壁虚构、随意撰写。

创作要走向现实更深处，需要突破自我想象的限度

但是，《江山如此多娇》对很多扶贫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普遍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想象性局限的。

曾经的记者身份是女主角沙鸥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觉得遭受了副县长不公待遇，发出质问；遭遇环保“一刀切”政策，发视频侧面揭发。每次都能推动所遭遇的难题迎刃而解。产业创业对她而言一样容易。培养喜妹当网红，短时间内浏览量轻松过百万；直播带货，上百斤的包谷酒订购一空。喜妹公众号发起桑树认领活动，经电视台稍加宣传，一天内便有一千多人认领，所获经费解决了村中分红的燃眉之急。如此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使一个个真切的难题都不配称之为“难”。

同样的想象化方案也频频出现在此前播出的其他一些扶贫剧中：原本的懒汉贾吉祥无意中开始了养牛直播，便成了网红，顺利脱贫；第一书记网络直播帮村民带货，轻松解决猕猴桃滞销难题。这些情节固然符合艺术真实，但与生活真实却存在着距离。

可以理解，作品想反映的是，发展互联网经济已成为农业转型的“风口”，是当前产业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可是，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村民，作为不了解电商运营基础与营销技能的“小白”，在早已成为红海、竞争极其激烈的直播领域轻易地突出重围，是否符合现实真实，还是仅是一种单纯的愿景？

近期播出的扶贫题材剧《江山如此多娇》的关注视角很广，覆盖了产业扶贫与精神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且能够从深层揭示扶贫现实中颇具代表性的真问题。然而，作品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提出，却具有想象化、理想化的色彩。如此矛盾的呈现对于当前扶贫题材创作而言，是具有典型性的，这使该剧有了值得评说的一面。



此外，沙鸥这一角色有着“卡里斯马”(charisma)式人物的色彩。扶贫路上，电视台领导是无条件支持她的神助手，不仅能适时地帮助碗米溪村开展宣传工作，甚至愿意拿出18万专项扶贫基金垫付村民的预分红，而且这还仅是沙鸥“随口一说”的情况下。此情节不禁使人联想起在霸道总裁保驾护航下顺利“打怪升级”的傻白甜。

只能说，创作者对扶贫工作的另一部分现实似乎还不够充分了解。近年来驻村第一书记的实践困境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笔者在一份中国农业大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了解到，第一书记扶贫工作的开展受到复杂的社会性、结构性因素影响。其中，原单位有限资源的条件限制正是掣肘之一。事实上，除了一些强势部门外，大部分第一书记的原单位是本身资源有限、资金紧张，很难为其提供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经费。

缺乏资源支持，在驻村工作中又处处受到当地条件的制约，无法顺利地推进工作的开展，这才是第一书记的真实工作处境，这也理应为扶贫剧所关注的严肃内容。如果想象化的解决方式、一蹴而就的解决过程能化解得了扶贫工作本身的难度之大、任务之重，那么扶贫又何需谈“攻坚”二字？

再如，作品对留守儿童心理缺失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请村里的姑姑教孩子们唱歌。连弹幕都一同质疑道：能解决心理问题吗？还是仅为了后续么姑家庭的矛盾激化情节进行铺垫？

如上种种，使人不禁好奇，作品提出的问题在实际的扶贫工作中到底解决没有？如果解决了，到底用了怎样的方式？如果没有解决，那更应如实地进行反映与呈现。

因为这恰恰为扶贫题材创作提供了更值得书写的素材，也将赋予作品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电视剧作为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其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扶贫剧如能将这些未解决的难题视为突破方向进行艺术升华与凝练，将对扶贫实践的开展乃至全社会对扶贫攻坚现实的认知都具有正面的启示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冷峻的现实问题与想象化的解决方案在文本叙事中纠缠、较劲，绝不是《江山如此多娇》一部剧的问题，而是当前一些扶贫题材作品的通病。扶贫题材创作虽然“看真贫”看得真切，可还须要观照“扶真贫”后续的一系列具体实践。这要求创作者走向现实的更深处，突破自我想象的限度。不然，作品中对扶贫现实困境的展示至多也只能激起观众的一份短暂的同情与痛心而已。

对困境的书写赋予电视剧创作以深刻的现实意义，而这里的“现实”理应包含无法克服的困难与始终未解的难题。如此，作品将被灌注更深沉、更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以此突破当前扶贫题材创作的限度，迈向更高的台阶。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

“第三只眼”看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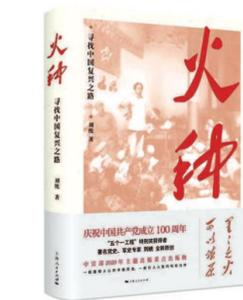
大视野·小切口·实佐证

看刘统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潘凯雄

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先生的刘统，此前尽管创作了许多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军事史的著述，然孤陋寡闻如我者却是在一年多以前拜读了他的《战上海》后才知其人，当时还以为这样一部本身充满了传奇色彩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在作者笔下竟然被处理得那么质朴，这是不是有点太过拘谨？此后在我们共同参加的一个论坛上有幸分享了他自己关于创作这类题材的一些心得后，才理解了刘统的基本创作观：那就是尽可能地穷尽相关资料，而且最好要原始的和第一手的，进而再梳理清它们间的基本逻辑，用事实发言，不刻意拔高、不预设立场、不轻易评论。有了这样一番铺垫之后，这次读到他的新作《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这部题材更重大、风格更无华的新作时也就有了相应的思想准备。

《火种》全书近50万字24章，意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探讨红色火种如何在漫长黑夜中成功燎原。我们既可以将它视为一部党史研究专著，也未尝不可以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来阅读。不过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段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中共党史自然都不会完全陌生，且不说从中学到大学都有这门必修课，而诸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绳主编的《中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刘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些有关党史的权威著述都曾是不同时期我们的共同读物。综合这些个因素，刘统这部《火种》的写作客观上就要面临着一个高台阶，而且这类重大题材加上非虚构的写作更不是啥主观创意、抖机灵就好使的了。

整部《火种》阅读下来，最令我折服的倒不是其立论与观点有多少新鲜多么深刻，而是他对大量一手原始史料的爬梳剔抉。坦率地说，《火种》中所涉及的众多人物与事件我过去也并非一无所知，但读完整部《火种》后的感受，首先是知识的增长与补白，许多自己过往不曾知道或知之甚粗的知识点在《火种》中得到了弥补；二是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弥补，对中国共产党何以诞生以及诞生之初何以那般艰难最终又何以走出泥淖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与认识。这显然比那种填鸭式教育取得的效果要好许多。静下心来，《火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得益于大视野、小切口和实佐证这三招。

尽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但《火种》的起笔却是落在这之前20年那令国人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签订，而落笔则止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年的“古田会议”。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一招：“大视野”。

如果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为轴心，《火种》却起笔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是因为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平等条约，标志着世界各国列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与掠夺，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彼时清朝的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但至少是不愿意江山在他们手中沦陷，于是就有了张之洞的君主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废除科举、小站练兵等一连串的所谓“新政”。然而，面对清王朝的病入膏肓，皇族的一系列把戏不仅挽救不了其自身终将覆灭的命运，反而将整个国家拖入了更加灾难的深渊。于是刺客与愤青、革命党人一次次起义等接踵而至，在这样一轮轮的冲击下，清王朝终于轰然坍塌。然而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内耗和涣散等秉性始终使他们无力撑起一个有力的共和国，政权又落入各路军阀之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于是新文化运动来了，“五四”运动爆发，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被送了进来……如此这般铺陈，其目的就是在用事实无声地阐明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莫名的横空出世，不是突发的一种偶然，而是中国的历史进入那个时代后必然的产物。而时间往后延，历数这个新兴政党创立之初虽面对敌人的枪口和刀刀，历经屠杀和围剿依然生生不息的事实，同样也是在用事实无声地阐明另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延绵不绝的顽强生命力。而此后，党的发展历程同样一再地证实着这一点。

《火种》的编排有讲究。全书24章，在目录和正文篇章页的每个章节之下均列有若干小标题，有点近乎“节”标题，少的有八个，多的则达17个，但正文中却又没出现这些小标题，只是内容依照这些小标题的顺序在推进而已，因此我只能称其为近乎“节”的标题。这些小标题绝大多数都是指向某个十分具体的事件，除去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嘉兴南湖一大闭幕”……外，也有“虚无党”“暗杀之风”“汤坑之战失败”“罗易泄密”等许多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二招：“小切口”。

每个小切口其实就是一桩桩具体的事儿，刘统将这些事儿写得十分生动具体，仿佛在牵着读者感同身受地重返那一幕幕真实的历史现场。在这里“真实”二字尤为重要，比如蔡元培过往在我的认知中就是“宽容”的化身，《火种》让我知道了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首倡者竟然也是这位蔡先生；比如陈独秀过往基本已固化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火种》中我们却看到了当时已被排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的首倡者竟然也是这位蔡先生；比如陈独秀过往基本已固化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火种》中我们却看到了当时已被排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的首倡者竟然也是这位蔡先生；比如陈独秀过往基本已固化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火种》中我们却看到了当时已被排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的首倡者竟然也是这位蔡先生……

刘统在创作《火种》时，对自己

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资料”，“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追求原始版本”，“不但要读档案和原始资料，还要实地考察”。这，就是我所言之的《火种》第三招：“实佐证”。

先说实地考察。为创作《火种》，刘统先后在湖南，从七溪村行到排埠村；在江西，从寻乌圳下村行到瑞金大柏地；在福建，从上杭苏家坡的山洞行到古田村……正是这些个实地考察，使他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初出茅庐时险些送命的惊险，“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坎坷和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而“这些感受，都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再说注重第一手资料。在南昌、秋收起义等相继失败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本应审时度势，积蓄力量、保存实力，但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却依然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因而提出了全面进行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即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领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而这样一次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竟然还是由那个刚到中国才几个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纳明益所掌控，于是就有了以广州起义失败为标志的城市暴动路线总失败，一大批共产党人沦为这条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如此血淋淋的惨痛事实如果“不读档案和原始资料”、不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真实的呈现。而类似这样由原始档案而还原的历史真实场景在《火种》中还有许多许多。

让事实说话，是《火种》总体上最鲜明的特色。虽然作者偶尔也会直接亮出自己的看法与评说，但这时候总体上并不是很多，读者更多的是在通过对刘统爬梳过的史料阅读后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评判。我想这样一种基于基本史实基础上的自我学习与思考所产生的效果，自然要比那种简单地接受说教与灌输的学习要好得多。因此，在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教育以及举国上下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本《火种》可谓恰逢其时，价值不菲。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